



荻生徂𠄎𠄎𠄎中的世界想像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7-04-17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雑, 志達, 宋, 琦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24729/00004303

荻生徂徠汉诗中的世界想像

雫 志 達・宋 琦

大阪府立大学人文学会 人文学論集 抜刷

第35集 (2017年3月)

获生徂徕汉诗中的世界想像

雒志達 宋琦

摘要：获生徂徕的汉诗创作中体现了一种以中华文化圈为依托的、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世界想象。徂徕集中有描写塞外、武陵等地点以及曹操、贾谊等历史人物的许多精彩诗篇，有些诗歌恰到好处，有些则在想象世界中走得太远。从徂徕诗中关于京洛、关中的描写可以见出，唐土想象同样在改变着诗人本来的生活环境。进一步说，徂徕的世界想象正处于日本“前近代”的时间节点，徂徕学完成了日本儒学的鼎盛形态，而包括地理在内更广泛的知识探求也就呼之欲出了。

后世文人在面对秦汉盛唐光辉的文学遗产时，总会产生一种时间上的“迟后感”。金元之际的诗人元好问在其《论诗三十首》中感叹：“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¹一方面前辈的典范足以“垂万世法”，而另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后世的社会制度、语言文字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环境下，想要在同一文学体裁上重现前辈的光辉，也就成了迷人又难以企及的理想。

尽管人文风物已经迥然不同，中国的诗人至少大体生活在同一地理环境中，但对于东亚其他国家的汉诗作者来说，他们与文学典范不仅有着时间上的“迟后感”，还有空间上的“距离感”。蕺园学派的开创者获生徂徕（1666-1728）是明代诗人王世贞、李攀龙相隔一个世纪的海外仰慕者，徂徕的诗句“安得中朝王李辈，与君大海割鸿沟”²表达了比元好问更深刻的感慨。明代复古文人对诗歌格调有着苛刻的要求，乃至避用中唐以后的典故，可以说为了重现汉唐的光辉，他们也在试图将自己想象为前代诗人。然而过于迷恋前辈的典范往往和诗歌“言志咏言”的本质要求产生一定矛盾。对于徂徕这位在睡梦中都以“中华人”自居的日本儒者来说，是迷失在时间与空间双重想象中，还是跨越这道“鸿沟”，写出契合本国文化与自己内心感悟的真正诗篇，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进一步说，徂徕的兴趣并不在于成为“海外七子”。顾春芳教授曾指出，后七子与徂徕有着反思程朱理学的共同思想立场³。正是这种反思促进了徂徕学的发展和成熟。如果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徂徕的精神世界依然延续着东亚文化圈的传统轨迹，而元禄、享保年间的日本正处在“前近代”时期，对世界的普遍性新认识还在酝酿之中。

一. 徂徕笔下的唐土世界

¹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元遗山诗集笺注》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² 获生徂徕《又寄》：一歌白雪动高秋。槎客如云不敢酬。碣石西连玄菟塞。扶桑东尽青蜓州。古来辞赋徒称汉。今日文章始识周。安得中朝王李辈。与君大海割鸿沟。《徂徕集·徂徕集拾遗》卷三。

³ 顾春芳《论古文辞学派如何接受后七子的文论》，《人文学论集》第33集，大阪府立大学人文学会，2015年。

徂徕曾经说“不佞借天之崇灵，得王李二家之书读之，始识有古文辞。”¹接触明人李攀龙、王世贞的文学思想是促成荻生徂徕学术转向的契机。复古派文人论诗极重格调，甚至将作品杂于唐人诗中，以不可分辨者为佳²。徂徕学养深厚，集中自不乏接近这一标准的佳作，但明朝与唐朝、日本与中国毕竟不一样，有时徂徕为了追求“置诸唐人集中不可辨”的效果，不免让诗中世界与所处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偏差，比如这首《送客临边》：

客边邻异俗，何啻恨离家。魂断天南雁，目穷漠北沙。非无龙碛月，自有燕脂花。日暮胡笳沸，毳毳拥虏车。³

诗人送客的地点难以考证，“漠北”基本不可能是远行者的目标，日本虽然南北跨度很大，但似乎并没有塞外大漠的地理环境和胡笳毡帐的游牧民族。徂徕此诗没有标明是对旧题的拟作，如果是真实的送客诗，那么他也许在唐代的边塞想象中模糊了本来的情境。实际上，如果我们对比唐人于鹄的同题作品，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诗的渊源：

若到并州去，谁人不忆家。塞深无伴侣，路尽只平沙。碛冷唯逢雁，天青不见花。莫随征将意，垂老事轻车。⁴

于鹄的作品有着典型的唐代大历时期风格，诗中的塞上随着征途而逐渐展开，行人在风沙中北上，途中只能遇到南下的鸿雁，意象与情绪非常契合，最后一联更是表达了游幕文人“不如归去”的感慨。徂徕作品的意象与用韵都很接近于鹄，这类似明代复古派文人所热衷的对唐人格调的重现，然而我们更多是看到徂徕想象中的边塞世界，诗歌本身仅仅停留于格调的形式，并无太多可称道的地方。

唐代长期处于与突厥、吐蕃、回鹘等政权的战争状态，许多文人都有在节度使幕府任职的经历，明人虽然未必像唐代那样频繁出塞，但边塞征戍却一直是受到推崇的题材，王世贞《艺苑卮言》中所录明诗如“漠北征人齐倚剑，城南思妇独登楼”、“云外旌旗娑勒渡，月中刁斗受降城”⁵都属此类。不过大历以前唐朝的边塞经略以扩张为主，因而诗中往往洋溢着建功立业的高昂意气，此类诗歌也是徂徕所喜爱的题材，他的另一首《边上送故人》写道：

壮哉三尺剑，去矣一书生。北雪迷歧路，南云渺驿程。今朝辞玉塞，何日到金城。闻说汉班超，建勋戍己营。

诗歌前三联皆为对偶，最后以班超投笔从戎的典故激励友人，首联及全篇的用意让人联想起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⁶，颈联也与杨炯诗中“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⁷结构相近，虽然“玉塞”（玉门关）与“金城”（兰州）同样模糊了诗歌创作的原本场景，但初盛唐的风格更为明显，气度较《边城送客》更为雄健。

实际上，随着唐朝国力的消耗，中唐以后，诗歌中的许多常见边塞地名已经不在王朝的

¹ 《答屈景山第一书》，《荻生徂徕》，岩波书店，1973年，第529页。

² 按：将作品杂入前辈集中的做法未必始于明代，但这是明人尤其是复古派惯用的文学批评思路。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谓贾岛诗“‘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置之盛唐不复可别。”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谓“宋初诸人九僧辈尚多唐韵，惠崇咏鹭云‘曝翎沙日暖，引步岛风清。照水千寻回，栖烟一点明。’置之盛唐那可复辨。”续编卷二称明人高叔嗣、薛蕙之诗“置之唐人毫无愧色。”

³ 《徂徕集·徂徕集拾遗》卷三，《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三卷，ベリかん社，1985年。

⁴ 于鹄《送客临边》（英华作送张司直往单于），高棅编《唐诗品汇》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2012年。

⁵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册，中华书局，1983年。

⁶ 杨炯《从军行》，《全唐诗》卷五十，中华书局，1960年。

⁷ 同上。

控制范围，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云“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指出“凉州是当时已经失去的边境州府之一，凉州曲在828年会引起对唐代失去的荣耀的怀念”。¹唐以后的诗人虽然常常迷失于前代的边塞想象中，但我们不必对此过于苛求。徂徠的诗句如“如何机中影，一似塞上霜”（卷一《关山月》）、“烽火夜连碣石间，将军万马下榆关”（卷一《边马有归心》）、“阴山衔落日，大漠起悲风。严角声连塞，归禽影灭空”（卷二《边城落日》）等都表现出典型的边塞想象，不过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许多诗歌只是对古题的拟作。大漠阴山出现在日本文人笔下会让读者察觉到想象成分与现实的脱离，但是在中国的其他朝代，来自江南、荆湘、闽粤的诗人集中同样有大量类似的习作。如同边塞诗歌的经典化一样，某种题材的诗歌在受到欢迎的同时，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也在逐渐加重，有时可以超越具体的地理空间的变动而独立存在，在这种语境下，一个地名代表的更是数百年沉积的文化想象，徂徠有《武陵泛舟》一首云：

云是武陵地，桃花两岸临。冀逢黄发宿，行访白云深。灼灼霞成绮，萋萋山自阴。停舟猿叫断，何处古人心。²

武陵、桃花、黄发垂髫，这都是我们所熟知的桃源典故。地处湘西的武陵本就不是古人能轻易到访的范围，比起地理方位，这个地名代表了更多的文化意蕴，徂徠另有一首《草堂前桃花盛开与卓上人吉生同赋得源字》：

春雨武陵郭，小桃映深尊。纵非避秦地，对尔似仙源。³

由题目可知，此诗是雅集的唱和中分韵所作，面对桃花而分得“源”字，徂徠自然而然地想象自己置身于武陵郡中，此时所处是否为“先世避秦时乱”⁴的地方已经不再重要。诗歌本就是对象象的重构，正所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⁵，没有想象，诗歌也会索然无味。比如“西昆体”的独特魅力正来自于奇崛的想象，李商隐本人则不必去过蓬莱仙山。徂徠诗中的“武陵”可以说是本就存在于虚幻世界的地点，就像西昆体中的“蓬莱”、“昆仑”一样，故而我们可以给予足够的理解。但正如诗中所说，“纵非避秦地，对尔似仙源”，徂徠只需要一点细微的提示即可跨越想象的大海鸿沟，如果他总是将本非避秦之地的场景投射在桃花源中，那对后世的读者也造成了一定困扰，下引两诗中，我们便可看到一定端倪：

斜随山径涉崇丘，踟蹰崎头想旧游。记得曹王横槊事，英雄自古有风流。（《踟蹰崎》）⁶

回头直北郁葱茏，汉殿秦宫仿佛开。因忆文皇登极日，代来谁似贾生才。（《丁酉元日展先墓途中从城南却望气色佳甚偶尔口占》）⁷

踟蹰崎在今日本山梨县，安土桃山时代的踟蹰崎馆是甲斐武田氏的居城，徂徠站在踟蹰崎山顶并未想起日本战国的有力者武田信玄，而是将想象投射到魏武帝曹操身上。信玄与曹操都是乱世中富有魅力的英雄人物，徂徠想到什么也是他的自由，但他的想象跨度太大、转

¹ 宇文所安《晚唐》，三联书店，2011年，第74页。

² 《徂徠集·徂徠集拾遗》卷二。

³ 《徂徠集·徂徠集拾遗》卷四。

⁴ 陶渊明《桃花源记》，《陶渊明集笺注》卷第六，中华书局，2011年。

⁵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苏文忠公全集》卷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⁶ 《徂徠集·徂徠集拾遗》卷五。

⁷ 《徂徠集·徂徠集拾遗》卷五。

换太快，眼前的山川与山川本来的历史显然已经在诗中退居次席。

第二首诗中，祖徕无疑在想象世界中走得更远了。明初诗人高启的名篇《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云“秦皇空此瘞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¹，据说为了压制金陵的葱郁王气，秦始皇在此埋下黄金以为“厌胜”。祖徕受高启的影响很深，他在《次韵子彬马上口号》中所咏“纵有梅花宁可问，只今江上是长安”或正是化用高启的“知尔西行定回首，于今江左是长安”，不知道祖徕看到江户（东京）的郁葱气色时，是否联想到了高启的诗句？然而祖徕接下来并没有讲到吴宫花草、晋代衣冠等南京风物，在他眼前展开的是长安的“汉殿秦宫”。下面两句祖徕提到了汉文帝与贾谊的典故，这与李商隐的名句“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²用意相近，“宣室”是西汉未央宫中的宣室殿，汉文帝曾于此殿召见之前被贬至长沙的贾谊。获生祖徕之父方庵公曾在1679年被当时的藩主德川纲吉流放，是年祖徕只有十四岁³，诗中引用“逐臣”贾谊的典故或正是指祖徕少年时的流放经历。题中的丁酉是指1717年，当时方庵已经去世十一年，这和“元日展先墓”的叙述一致。在这首诗描述的世界中，德川幕府的中心江户与中国的都城金陵、长安重合在一起，诗人父子的身世同样和在“秦宫汉殿”中被召见的贾谊融汇无间。题为“口占”的绝句属于即兴创作，祖徕笔下依然可以看到一些前辈诗人的影子，有趣的是，以朦胧著称的李商隐在《贾生》中做出了“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清晰评判，而祖徕的作品由于多重想象，反而使主题过于隐晦了。

祖徕诗歌中的想象有时恰到好处，有时则走得太远，这和他的学习方法有一定关系。祖徕与他效法的复古派文人一样，都非常强调对古作的“涵咏揣摩”。复古后七子之一的谢榛认为当取初盛唐可法者十四家，“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⁴王世贞则更具体地指出：

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班氏汉书，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咏之，令其渐渍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分途策驭，默受指挥，台阁山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⁵

祖徕在试图理解王、李的著作时，同样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始自六经，终于西汉，终而复始，循环无端，久而熟知，不啻若自其口出，其文意互发，而不复须就注解。然后二家集，甘如噉蔗。⁶

“揣摩涵咏”的方法与孟子主张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⁸一脉相承，这正是儒家文艺观下的典型学习方法。问题是祖徕与复古文人一样，沉浸在典籍中太久，精神世界不免和

¹ 高启《送沈左司汪参政分省陕西汪由御史中丞出》，《高太史大全集》卷十四，四部丛刊本。

² 《祖徕集·祖徕集拾遗》卷七。

³ 李商隐《贾生》，《玉溪生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14页。

⁴ 参见王青《日本近世儒家获生祖徕研究》附《获生祖徕简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⁵ 谢榛《四溟诗话》卷三，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

⁶ 王世贞《艺苑厄言》卷一，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册，中华书局，1983年。

⁷ 《复安淡泊第三书》，《获生祖徕》第537页。

⁸ 按：“以意逆志”见《孟子·万章上》：“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释为“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知人论世”见《孟子·万章上》“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朱熹解释为：“既观其言，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孟子强调后世学习者应当通过对诗文的阅读与揣摩，了解诗文所作的时代背景，进而体会作者的心境。

现实环境产生一定的出离，甚至在即景抒情之时脑子里都是前辈的佳句，这和宋人“资书以为诗”¹又有多大区别呢。打倒了汲汲以载道为务的宋人，而无意间又走上了前七子派李梦阳所批评的“考实而无文，抽华而无人”²这条老路，这也体现了古典诗文创作的矛盾处境。

二. 唐土想象与日本风物的融合

徂徕对中国文化非常崇拜，使得他的精神世界长期沉浸在“中华人”的想象之中，江户坊间甚至笑谈他在江户城中屡次搬家，只为能够离中华更近一些。正所谓“刘琨吹笳栗，夜感胡人心。纵然日本竹，岂乏汉家音。”（《成庆上人头管》）³即使在欣赏音乐时，他也以中原之声为衡量标准。不过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到江户时代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这样漫长的过程中，许多外来文化已经融入本国血脉，区分文化上的和与汉已经没有必要。我们不妨从徂徕笔下的京都想象出发，探讨“日本竹”与“汉家音”融合之处：

五十三驿莫言难，处处山川秋好看。明日先从函岭望，如丝大道达长安。

挥鞭意气惬秋凉，才子奉恩游洛阳。待到西山红叶好，锦衣相映早还乡。⁴

上引两诗题作《送菅童子游西京》，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长安、洛阳是西汉与东汉的首都，也是唐代的两京，西与东既是地理方位的对应，也代表了历史时代的区分。徂徕所谓西京是指于江户方位对应，地处关西的京都，在公元794年桓武天皇“平安京迁都”之后到明治维新千余年间，这里始终是日本名义上的国都。平安京在营造时便参考了唐都长安与洛阳的规划。京都在地理意义上被称为洛阳的情况更多一些，安土桃山时代的诸侯爆发了数次大战都是为了争夺“上洛”机会以获得天皇的承认。按字面意思理解，“明日先从函岭望，如丝大道达长安”，似乎是站在函谷关前远眺长安，然而第二首云“才子奉恩游洛阳”，何以一路前往西京，却来到了东都洛阳？如果按唐诗中的地理方位来看，我们不免要产生微妙的“违和感”。

在《赠子帅之洛》中，我们再次见到这个秦地的洛阳：

怜尔看花去向秦，花时最是帝城春。青山周匝浑如锦，欲醉只应无故人。⁵

随着历史的发展，京都已经可以与“洛阳”一词互相替代，今天的日本以东京为首都，但京都的一些市区依然保留了“洛西”、“洛东”等称呼。而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中，长安一词则衍生出了“首都”的意思。徂徕在《赠子帅之洛》中所说的“秦”指的是中国语境下的长安所在，或者因为京都位于关西地区，长安的首都意味指向第二句中的“帝城”，日本的“帝城”是京都，而京都的雅称叫做洛阳。徂徕诗接近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慨，与《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曲》）不同，王维的友人要前往荒凉的西域，“子帅”则要前往繁华的京洛，周遭环境的繁华使得远行者更加孤独，这是诗中用心之处，只可惜对中国读者来说，“向秦”与“之洛”的关联未免过于复杂。

徂徕诗歌中有大量对“关中”景物的描写，包括“函关”、“骊山”等场景都在他笔下出现，按照中国的地理方位，这当然是指函谷关以西的长安地方。但有意思的是，徂徕的“关中”并非他以“秦”来指代的关西地区，而是与之地理方向相反的，江户所在之关东平原。携手风烟百尺台，关中极目郁葱哉。八州绮错雄都列，万舸浮萍大海来。染翰春云多点

¹ 按：刘克庄《后村集》卷九十六《韩隐君诗》谓“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

² 李梦阳《论学上篇第五》，《空同集》卷六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³ 《徂徕集·徂徕集拾遗》卷四。

⁴ 《徂徕集·徂徕集拾遗》卷七。

⁵ 《徂徕集·徂徕集拾遗》卷七。

缀，衔杯落日且徘徊。登高作赋才非易，共指芙蓉雪色开。《《春台望》》¹

江城初日照芙蓉，西望函关白雪重。无限武昌郡中客，阳春一曲少相逢。《《新岁偶作》》²

何物芙蓉落日寒，关中霁迥彩云端。青天一柱峥嵘出，白雪千秋突兀看。《《望岳》》³

诗中再次出现了对郁葱“佳气”的咏叹，生机勃勃的草木与雄州雾列的江山与让人联想到帝王所居，但我们知道，中国的关中是不会看到大海的。从比较的视角来看，“芙蓉岳”是个更值得玩味的意象。“芙蓉”是富士山的别称⁴，也是关东平原的最有代表性的景观，中国的西岳华山同样得名于形似莲花（芙蓉），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写道“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⁵上引高启诗云“函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⁶华山与函谷关都是秦地的标志。徂徕所谓的“函谷关”应当是指京都与天津之间的逢坂关卡，这是区分关东与关西的分界线。在今天河南灵宝的函谷关实际上在陕西华山以东，华山是无法“西望函关”的。《望岳》诗中没有涉及具体的方位，站在关中的城楼上眺望“芙蓉峰”，不管对中国还是日本诗人来说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唯一不同的是，“白雪千秋”之景不会出现在华山顶峰。

徂徕的关中描写很容易让读者迷失在文化上的近似与地理上的错位之中，诗中的意象、音韵和构思都非常熟悉，尤其是关中诸诗，气象雄浑，这同样是明代复古派文人所欣赏的格调，比较徂徕《春台望》与李攀龙《秋杪登太华山绝顶》第一首，可以见出他们的风格非常接近：

华顶苍苍四望开，正逢萧瑟气悲哉。黄河忽堕三峰下，秋色遥从万里来。北极风尘还郡国，中原日月自楼台。君王倘问仙人掌，愿上芙蓉露一杯。⁷

两诗创作时间一春一秋，细节上可看到杜甫《登高》⁸的影子。与杜诗一样，这两首登高远眺的抒怀之作均押在“灰韵”上，尤其颈联对两个“关中”的景色描绘，力求悠远壮美，可以见出与杜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类似构思。若王世贞、李攀龙看到徂徕这位海外弟子的作品，相信他们也会给予首肯。不过复古文人“置诸唐人集中”的方法显得很尴尬，徂徕诗有着令复古派满意的格调，对明代嘉靖时期的诗人来说做到这一点不会产生与唐代地理的错位，但有基本地理知识者都可以看出，徂徕诗中那些熟悉的地点其实指向一个环境完全不同的国家。

其实唐以后中国的统一王朝没有再定都关中，而是逐渐以南北两京为政治轴线。然而明代是个“举世宗唐”的王朝，据《明太祖实录》载“初，元世祖自朔漠起，尽以胡俗变易中

¹ 《徂徕集·徂徕集拾遗》卷三。

² 《徂徕集·徂徕集拾遗》卷五。

³ 《徂徕集·徂徕集拾遗》卷五。

⁴ 富士山，“別名としては、不二山・不尽山・布土山・富岳・芙蓉峰などがある。”村石利夫编著、池田末则监修《日本山岳ルーツ大辞典》竹书房，1997年，17页，参照。其中，富士山被称为“芙蓉”是因为富士山宏大秀美，外形如同芙蓉花，另有说法为富士山顶的“八神峰”宛若芙蓉花瓣。

⁵ 《李太白全集》卷六，中华书局，2011年。

⁶ 高启《送沈左司汪参政分省陕西汪由御史中丞出》，《高太史大全集》卷十四，四部丛刊本。

⁷ 《沧溟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

⁸ 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国之制……上久厌之，至是悉令复旧。衣冠一如唐制。”¹明初的儒者宋濂、刘基以及建文时方孝孺等人均有志于“驾轶汉唐，锐复三代。”²七子后学胡应麟将汉、唐与明代相提并论：“自《三百篇》以迄于今，诗歌之道，无虑三变：“一盛于汉，再盛于唐，又再盛于明。”³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号召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才应运而生。在明人看来，自己所处的时代就是现世的盛唐，所以都城在哪里，哪里便是长安。永乐迁都以后，“长安”在文人笔下成为北京（顺天府）的别称，而很少指向这个名称原来的所有者陕西西安，有的情况下，一个唐代长安的标志性地点就可以做出足够提示，王世贞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梁舍人来得惟敬书，知旦夕北首，愁未办装耳。仆老此山镇，粗饭浊醪，翰墨自宽，了不知其薪之积也，春来作梦，无非故国，遂与春明门绝矣。”⁴所谓“薪之积”即指后来居上者日众，王世贞此信当作于嘉靖中在京为官时期，当时他为辅臣严嵩所不喜，九年不调任，“与春明门绝”便是说王世贞想要离开京城，辞官归乡。我们知道，春明门是唐代长安城的东正门，明都北京并没有同名的地点。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明代士大夫有时也在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来想象盛唐，处理得当的话，这种双重追溯便不会妨碍作品中的唐人风格（至少是他们所认为的唐人风格）。徂徠对汉诗风格的驾驭非常自然，这一方面因为他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学的浸润，或者说精神世界的中国化；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日本的汉学传统与文化环境，即中国知识的本土化。唐代诗人王维在为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所作《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中说：“海东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⁵日本知识人不需要只坐在书斋里追慕汉唐，他们也有自己的“关中”与“芙蓉”，在中日千余年的彼此影响之中，他们也试图将日本构建为另一个盛唐。实际上，汉唐文学的光辉成就本不在于堆砌几个熟悉的意象，而是诗中情感与意象的完美契合，远隔地理的大海与历史的鸿沟，依然可以在万里之外、百代之下令人感动。明代的前后七子一方面也强调学古人之神而不独学其形式，一方面又认为只能在古人的形式里才能领悟其神髓，这是一种迷惑。徂徠诗歌因为时空的种种显而易见的分歧，也许不可能“冒充”唐人作品，但抛开那些与唐土的不同点，其实无损于诗歌本身的意境：

高台宴罢散珠蹄，才子多情醉欲迷。不惜樱花飞作雨，行云本在骊山西。（《春日陪西台侯游骊山分韵》）⁶

骊山诗是个有趣的范例。周、秦、汉、唐等定都关中的王朝都曾在骊山大兴土木，在中国的诗歌中，歌咏骊山往往指向对君主好大喜工的批判，比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秦始皇的阿房宫、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典故。很难考证徂徠此诗写于日本的什么地方，诗歌依然是君王游冶的题材，很像中国诗中对楚襄王与巫山神女的描写，但这是一座樱花盛开的、东海海岛上的骊山。日本学者石川忠久提到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现代日本，英语水平高的人很多，但是又能用英语创作诗歌的人吗？如果有，他们的诗歌能体现日本独特的趣味吗？答案是‘NO’”⁷，东亚的朝鲜、日本等国在审美趣味上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尽管汉诗创作是徂徠这

¹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二六，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原北图红格本校印本。

²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逊志斋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

³ 《诗薮》续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⁴ 《与欧楨伯》，《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卷二百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⁵ 《全唐诗》卷一百二十七。

⁶ 《徂徠集·徂徠集拾遗》卷六。

⁷ 石川忠久《日本の漢詩》序，日本大修馆书店2003年版。

样的精英阶层才有能力进行的活动，但抛开语言的差别，我们当对这种共同的文化基础予以充分理解。

三. 徂徕汉诗的世界想象与日本学术新变

蕺园学派是明代复古格调派文人的追随者，有意思的是，在日本文学史上，他们的评价也和复古诸子差相近似，江户后期诗人友野霞舟在《锦天山房诗话》序中总结：

延至元禄享保，作者林立，就中木门蕺社之徒最盛，人人口开天下而不舍，羞用唐以后事，虽持论过高，用典太隘，均不免模拟短钉之病，动招后人刺讥，然其有功于艺苑，亦不可废也。¹

徂徕与前后七子一样，在后世都不免于“剿袭模拟”一类评价，然而对于徂徕来说，古文辞只是他“梯子古”的方法，徂徕认为：“今言非古言，今文非古文，吾居于其中，而以为是求诸古，乃能得其名者几希……故欲求圣人之道者，必求诸六经以识其物，求诸秦汉以前书以识其名，明与物不舛，而后圣人之道可得而言焉已。”²顾春芳先生指出，徂徕在日本推行李、王的文学主张，正是“针对当时在儒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朱子学派而言”。或者说，文学复古为徂徕提供了上溯六经的途径，从而也就获得了比宋儒更具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与何景明为了文学复古的“舍筏”与“登岸”而激烈争执，但在徂徕这里，对古文辞的学习本身就是渡津之“筏”，他的“岸”则指向了更遥远的“六经”和“圣人之道”，是以他还感叹“李王二公没世用其力于文章之业，不遑及经术”。所以尽管蕺园学派之汉诗有着和格调论者类似的问题，但当我们从其儒者的身份考量时，就可以发现二者对于古文辞有着完全不同的接受角度。

关于日本人的“世界观”，专门从事古地图研究的川村博忠曾进行过总结³。从最初基于原始信仰的天地概念到渐渐认识世界的真实面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日本士人的世界想象正是依托于中华文化圈。南北朝时期怀良亲王在给明太祖朱元璋的信中谦称夷狄，地理上相比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日本是“远弱之倭”，但信中接来说：

臣闻陛下有兴战之策，小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⁴

怀良认为尽管中日有国力之强弱，但文化则系出同源，他们所在的日本正是一个“海外中华”。徂徕与怀良亲王的思路有些许相似之处，从他的诗中关于塞外、武陵、关中以及中华典故的书写中不难看出，徂徕的世界想象范畴依然是以中华为中心的东亚，这也使他有足够的自信更新宋人之学术，在日本通过应用“圣人之道”来解决江户中后期日益严峻的社会问

¹ 友野霞舟《锦天山房诗话》序，见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第八卷，日本东京风出版，昭和47年复刊。

² 《辨名》，《获生徂徕》第209页。

³ “古代日本人对于宇宙的真理以及自然现象等没有成体系的知识和说明理论，他们的自然观依托于一种由众神来护佑万物的泛神论……奈良时代佛教成为国家精神的基础之后，人们开始相信佛典中所讲述的较为难解的须弥山说，这使日本人对于空间的认知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宫殿中开始模拟须弥山的样子来建造庭院……到了中世的时候与神国思想联结在一起，世界由天竺（印度）、震旦（中国）、本朝（日本）组成的三国世界观开始广泛传播。到十六世纪耶稣会士将西洋的新兴世界知识和地球说传来之前，三国世界观深入日本人的心里。”川村博忠，《近世日本的世界像》ベリかん社，2003年，第9页。笔者译。

⁴ 怀良《戒严王思行程表》，李言恭《日本国志》卷五，明万历刻本。

题。

在安土桃山时代以及江户时代初期开始,南蛮世界屏风图作为房间装饰已经出现在贵族、大名和富商的家中。与荻生徂徠几乎同时的新井白石(1657-1725),是日著名的政治家、儒学家,通过与意大利传教士斯多梯(Givanni Battista Sidotti)接触,新井白石写成《西洋纪闻》一书,记载了许多世界地理、外国的风土人情以及对于基督教的介绍与评价。白石曾担任德川幕府六代将军家宣与七代将军家继的侍讲辅佐政治,徂徠先年在五代将军纲吉的侧用人柳泽吉保府邸讲学,后来得到了八代将军吉宗的聘用。作为当时的高级士人,这二人对于彼此的学识的大体了解是不言而喻的。在人类视野不断开拓的十八世纪,即使是国力鼎盛的清王朝也在与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强国拉开差距,而徂徠对于西方世界知识的东渐似乎并没有足够兴趣。然而没有人会对徂徠的成就提出质疑,思想史家向来以徂徠学为日本儒学发展的鼎盛,也是日本儒学发展的极限,历史无法跳跃性发展,或许没有徂徠,日本儒者还会在流派的辩难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进一步说,正是这一代知识人对中华文化的执着促成了日本儒学的繁盛局面,当思想史完成了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后,日本民族学术的觉醒和对近代新知识的探求也就呼之欲出了。